



创作谈

河南人民出版社

CHUANG ZUO TAN

创 作 谈

河南人民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创 作 谈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frac{7}{8}$ 印张 39千字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500册

统一书号7105·94 定价0.13元

目 录

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刘心武 (1)
深入生活 提高技巧·····	杨 沫 (7)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探索前进·····	姚雪垠 (11)
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张天民 (18)
《四书记》创作体会·····	徐 慎 (23)
从生活到作品	
——给一位不相识的朋友·····	段荃法 (34)
飞雪迎春话《丹梅》·····	叶文玲 (41)
在生活中锻炼，在生活中学习	
——习作民歌漫忆·····	钟庭润 (48)

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刘 心 武

向同志们谈一下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创作过程。

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开始，也就是“四人帮”揪出刚刚一个多月起，当时北京市创作联络办公室，组织业余作者开了一系列批判“四人帮”反动文艺理论的座谈会。我参加了这些座谈会，深受启发。我痛切地感到，对广大业余作者，特别是对于我自己来说，首先应当同“主题先行”、概念出发的创作路子决裂，回到马、恩、列、斯和毛主席所一贯倡导的从生活源泉出发的正路上来。

这样，我就开始回顾近几年来生活。担任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种种场景，以及我所熟悉的人物：教师、学生、家长……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行作为，都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而我自己在这几年的工作、生活里所感受到的喜怒哀乐，也油然地涌上了心头。我为什么要抛开生活里真实的矛盾冲突、人物和事件，另外去根据概念瞎编故事呢？

随着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向深入发展，一方面，加深了我对过去几年的生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我与“四人帮”那一套文艺创作“帮规”斗争的决心。我心里开始萌生着一个念头：“四人帮”对学校教育的破坏，不仅表现在砸碎玻璃这类的“外伤”上，更要紧的是给下一代心灵上造成了“内伤”，我能不能写一篇小说，从这个角度来控诉

• 1 •

“四人帮”呢？在一九七六年年年底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结合批判“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的罪行，摆出了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一种是“四人帮”造成的畸形儿，问题暴露在外，比较容易引起人们注意。还有另一种学生，他们品行端方，要求上进，当着小干部，被认为是标准好学生，但是由于“四人帮”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熏染他们，使他们思想僵化、片面；“四人帮”的“血统论”、“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之类的毒货，由于裹上了“革命”的外衣，被他们天真地奉为真理，结果，他们也成了精神畸形的青少年。例如我接触过这样的小干部：她绝对不看“十七年”的小说，认为统统都是毒草；她绝对相信当时报上的一切文章，把梁效、罗思鼎炮制的大毒草看作是最好的学习材料；为了写“批孔批周公”的儿歌，她可以熬个通宵，班主任老师不同意她提出的“每人写一百首儿歌”的倡议，她便怀疑班主任老师“有问题”。直到“四人帮”揪出以后，这样的小干部在一些问题上仍然糊涂，他们不理解《青春之歌》这样的“黄书”为什么要再版，他们甚至认为高考改革是“复旧”、“复辟”……我在那次座谈会上说，我们应当作这两种青年的工作，尤其对后一种，更应当促他们猛醒；他们的问题，不大容易被发现，发现了也不大容易被重视，总认为他们反正本质纯正，可以放心；其实，如果他们不能转变，甚至进一步恶性发展，那就比小流氓更具破坏性。参加过那次座谈会的同志不难发现，我讲的这些，实际上就是构成小说《班主任》的基本素材，小说中的小流氓宋宝琦和小干部谢惠敏的形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这次座谈会以后，一有空闲，我就酝酿这篇小说，经过

几个月的反复酝酿，到了一九七七年夏天，强烈的写作冲动来了。本来，我还想再等一等、看一看，希望有别人先我而行，发表出揭露“四人帮”给下一代心灵造成“内伤”的作品，使我不致有所借鉴，有所遵循。但是，眼看着宋宝琦式的小流氓急待挽救，目睹着谢惠敏式的小干部仍未觉醒，我感到必须鼓起勇气，拿起笔来参加抓纲治国的战斗。

当时我已到出版社工作。我是在出差密云县时，利用晚上的时间开始写这篇小说的。铺开稿纸以后，我勉励自己说：这回，你一定要忠于生活，严格地从生活出发，人物、故事、细节、语言，都要从生活中提炼，主题也不要事先拟好几句话，然后去加以图解，一定要在写作的过程中，尽量往深里开掘，把自己对生活的思考，真诚地贡献给读者。

动笔以后，开始很顺利，我写到了张老师，写到了宋宝琦，写到了围绕着接收不接收宋宝琦，在教师之间引起的争论……渐渐地，我孕育很久的一个形象——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向笔下走来了，写到这里，我一下子却又犹豫起来。固然我在创联办的会上发言时，提到过这类青少年的问题，但那毕竟是一次小范围的非正式发言，现在可是写小说，要争取拿出去发表给广大读者们看。生活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宝琦，这一点广大读者会是深有体会的，把这样的形象写入作品，虽然担着一定的风险，多数读者恐怕还是能够接受的；而生活中还有着不少的谢惠敏，这一点究竟有多少读者能够承认呢？把谢惠敏这样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的团干部，写成被“四人帮”造成“内伤”的状态，会不会被扣上“污蔑”、“丑化”的大帽子呢？会不会被认为是搞“暴露文学”？我特别为此翻阅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

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下列指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我想，我暴露的是“四人帮”这一黑暗势力的罪恶，我没有错；而且，我是通过正面人物张老师的目光、思想来揭示这一点的，并不是纯客观的暴露，而是有所分析、有所批判；此外，我特别注意了对政治上的以及自然界的春天气氛的渲染，而且勾勒出了石红这样的形象，构成一片光明，使所暴露的黑暗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也许我处理得还不尽准确，还不够艺术，但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搞的并不是“暴露文学”。我又进一步想，《班主任》这个短篇小说，里面并不出现“四人帮”本身及其爪牙，也就是说，没有敌人的形象，那么，对宋宝琦、谢惠敏身受“内伤”这一点揭示，会不会犯暴露了不该暴露的东西的错误呢？我又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论述：“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是人民大众。”我觉得，自己所暴露的恰是“四人帮”在人民中遗留下的恶劣影响，“内伤”在宋宝琦、谢惠敏身上，凶手却是罪恶的“四人帮”，因此，我应当大胆地写下去。

思想上明确了，写作冲动又袭上心头。正如在《班主任》中说的：“对丑类的恨加深着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爱又加深着对丑类的恨。当爱和恨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有了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穷勇气，就有了不怕牺牲去夺取胜利的无穷力量。”我一鼓作气，利用几个夜晚，顺利地写完了全稿。

稿子写完以后，我没有马上送出去，我把它撂到抽屉

里，我觉得自己还需冷静下来，再仔细想一想，这样一篇小说究竟能不能加深读者对“四人帮”的恨，对祖国和人民的愛，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九月里，有一天我忙完了编辑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当夜深人静之时，拉开抽屉取出了《班主任》的稿子，读了起来。我被自己写下的东西感动了。这在我还是头一回。我朦胧地感觉到，我在这之前虽然也写过一些东西，但只有这一回，才算是真正走到了正路上。

小说发表出来以后，编辑部和我陆续接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广大读者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鼓励，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些青年来信，说自己和作品中的宋宝琦、谢惠敏差不多，决心洗涤“四人帮”在自己灵魂上泼下的污垢，以实际行动向二〇〇〇年的“四化”远景进军。

许多读者以及文艺界的领导同志、老前辈对我这么个还很幼稚的作者和《班主任》这么个小小的短篇小说给予如此热情的支持和扶植，使我非常感动。我意识到，同志们肯定这个短篇小说的意图，还不在肯定这个小说本身，而是在肯定一条正确的创作道路，这就是我国从“五四”以来特别是从毛主席光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一直所遵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条道路被“四人帮”割断了十多年，

“四人帮”用“三突出”之类的迷魂阵把创作引上了一条崎岖狭窄、最后通向绝境的黑路，现在我们要扫荡“四人帮”布下的迷魂阵，使文艺创作回到革命现实主义的正路上来。我们一定要从生活出发，从实际出发，透过生活现象去揭示生活的本质，使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政治的真实统一

起来，使我们的作品真正能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感奋起来，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深入生活 提高技巧

杨 沫

文学艺术是有它的特殊规律的，要想写出高质量的作品，确实很不容易。拿我自己来说，为了想把作品写好，常常感到苦闷，常常不断地探索——怎么样才能把作品写好？才能使读者喜欢读？才能起到文学作品应有的感染人、教育人的作用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诀窍。只想到一条，就是努力掌握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

要想写好作品，首先要写好人物。因为作者的一切主观愿望、主题思想，都要通过人物来表现。要想写好人物，那就必须熟悉你所写人物的时代背景、环境、阶级属性等等特征。所谓“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确实是一条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四人帮”统治文坛的时候，那些什么“三突出”等等所谓创作法则，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全要把人物写成金刚怒目式的所谓英雄。一个普通农民杨白劳，不许他喝卤水愤而自杀，却要把他改成拿起棍棒去打黄世仁的英雄。这失掉了生活的真实性，也就失掉了艺术上的感人力量。我常想，我要不是在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要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进攻下，正当我个人失学失业、走投无路的时候，幸而遇见了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党的拯救和培养，我绝不会写出《青春之歌》这部小说来的，也不会塑造出林

道静、卢嘉川、林红这些人物来的。所以，我在从事创作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要有生活，尤其写长篇，更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当我写我熟悉的生活和人物时，我就写得比较顺利，容易把人物写得活一些；当我写到我不熟悉的生活和人物时，就困难，就费力很大，而又不容易写好。所以，要深入生活，熟悉了解各种人——尤其是了解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不要把英雄人物写得千篇一律，都好象是没有感情、没有内心矛盾的木头人。“四人帮”臆造的“英雄”，全是那种没有家庭、没有爱情、也没有内心矛盾的虚假人物，所以，那时候他们许可出的许多作品，群众不喜欢读，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可以说，白浪费了不少纸张，也给许多作者包括青年业余作者，造成创作思想的混乱。真是害人不浅！

一个作者有了生活，也熟悉了人物，但是如果没有掌握一定的写作技巧，仍然不会写出感人的作品来的。十八、十九世纪的许多世界名著，那些作家掌握的思想内容和生活内容，比起我们中国现在作家的思想，比起我们这个时代的光彩照人、绚丽多姿的生活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是，他们有许多作品我们拿在手上就放不下，就想一气读完。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掌握了写作技巧，注意研究写作技巧，掌握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这好比，有很好的鱼和肉——我指的是生活，但是如果你没有掌握好烹调技术，就是有再好的东西，你也做得不是味、做得不好吃。而有些文学家，他们手里掌握的鱼肉也许并不太多，也不太好，可是他们善于烹调，不太好的原料，他们也能做得挺好吃，叫人们爱吃。这一点，使我确切相信，要想写出感人的优秀作品，必须要学习掌握写作技巧，要下苦功钻研技

巧。当前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突破创作上的各类禁区！当今世界各国作家，不管他们的世界观如何，他们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但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他们非常注意钻研写作技巧，注意研究读者的心理和爱好。我们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难道我们就可以不研究读者的心理和爱好么？！没有艺术性的作品，你的思想性再高，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四人帮”不仅坑害了老一代作家，十年光景剥夺了他们创作的权利；而且也毒害了青年一代，什么“主题先行”、

“三突出”等等一套模式，使得他们既读不到多少作品，也不懂得什么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更不能提什么钻研艺术技巧。因此，写出的东西，干巴巴的没有人喜欢看。这种流毒，直到今天仍然远远没有肃清。在创作上仍有一套无形的条条框框在束缚着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手脚。举个例子：电台最近在广播小说《青春之歌》时，把不少描写爱情的场面都给删掉了，甚至把马克思、列宁都很欣赏的德国大诗人海涅的诗也给删掉了。怎么印出来可以叫读者反复去读的东西，电台里播送的时候，一听就过，都不可以听呢？这是一种什么思想、理论在影响那些编辑同志呢？要写好人物，就应当叫你所写的人物有血有肉，有思想也有情感，是活人，不是神仙。爱情是青年生活中最普遍最常见的事，就是英雄，他要战斗，要工作，同时也要吃饭穿衣，也要恋爱结婚。写英雄光知道恋爱，光知道家庭琐事，那就不成其为英雄；但是写英雄光知道战斗、工作，却从不知道什么是恋爱结婚，不知道生活，这个英雄恐怕也不易叫读者喜爱，觉得他不是活人。

当前，有许多有形的、无形的条条框框还在那儿遥控着我们的创作思想；“四人帮”的流毒还在不断地兴妖作怪。

“心有余悸”这种状况到处可见。我自己在创作上，就仍然不能完全放开手脚，使我常常苦闷地感到，好象有一根无形的绳子捆绑在自己身上。因此，我要大声呼喊：我们要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认真地落实在创作上！我们要大胆地冲破各种各类的禁区；要敢于独出心裁、不落陈套，努力钻研艺术技巧；要敢于用各种新颖的形式、体裁、题材，从各个方面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生活、新思想、新感情！要细心体会广大读者的心理、爱好和要求，写出又新又美使他们爱读的作品！尤其要多出些个伯乐去发现千里马——各个方面都要想方设法去发现和培养大批文学人才。这样一来，我相信我国的文学事业，也将象科学事业一样，可以早日攀登世界高峰！我国的科学的春天快要到了，我热烈地企盼，我国文学艺术的春天，也将在不久的将来，争妍斗艳地来到。它不仅在国内使万众惊喜；也将在国际上开放出无产阶级文艺的艳丽花朵！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探索前进

姚雪垠

一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已经一周年了。中国人民缅怀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建立的不朽功勋，正在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和工作成绩来纪念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今天我也正在利用我的晚年继续实践我的创作宿愿，为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尽我的微末力量，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我能够成为一个小小的参加者，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使我感到无限振奋和光荣。思今抚昔，不能不感激毛主席和党给我的教育，使我获得新的艺术生命。

毛主席对于我国的知识分子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和正确的评价。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背负着沉重的因袭包袱，经历着曲折的生活道路，但只要在思想改造上有一点进步，在工作上有一点成绩，毛主席总是给予肯定和鼓励。《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之后，我得悉他老人家曾表示希望我将全书写完。这一指示，使我获得了无限鼓舞，也使我终生感激。在

“四人帮”控制文艺工作的日子里，我写《李自成》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以至无法继续下去。我不得已于一九七五

年十月间给毛主席写信，汇报我写作《李自成》的进程和计划。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百忙中，再一次给我以巨大的关怀和支持，使我能够继续专心致志地进行工作。我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怀和支持，也是对全国愿意为党和人民做点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关怀和支持，勉励我们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二

关于我写《李自成》一书所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发、教育和指导，更是多方面的。可以说，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就不可能做出微末成绩。

我打算写《李自成》这部小说的动念虽然产生于抗日战争期间，但只是到了解放以后，我才有机会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指导，使我对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认真地进行思考和研究，于是下定决心要写出这部小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科学论述，好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正在探索前进的崎岖征途。毛主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许多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丰富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揭示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总规律，这是我们研究祖国历史、认识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理论原则。

二十年来，在写作《李自成》的崎岖道路上，我曾经遇到过很多引起我深思的问题，例如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将李自成写成毫无帝王思想的人，他革命成功就要建立一个解放了

的农民政权，而不是大顺帝国；也有的认为应该写他没有天命观，没有封建社会中的迷信思想，当然不言而喻，应该写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九七四年某大学的学报上就有一篇论文，说李自成是唯物主义者。）从一九七三年以后直到“四人帮”被打倒，要不要在《李自成》一书中写所谓“儒法斗争”，要不要将李自成写成反孔的英雄，都是摆在我面前的严重问题。但是在这些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我决心按照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规律的理论原则写下去。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仅见的。农民战争只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在尚未来得及建立政权或刚建立不稳固的政权就被打败了，另一种是成功地建立一个封建帝国，但是就革命的真正意义上说仍然是失败了。过去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之所以不能够使农民得到解放，“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每次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当时的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发展。

《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之后，在社会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我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一分为二的态度重新分析了自己的作品。一方面，我认识到由于我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够好，在作品中也还存在着不少毛病，甚至严重缺点；另一方面，我相信自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